



我的岁月

切尼回忆录

美国史上权力最大的副总统

In My Time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

[美国]迪克·切尼 莉兹·切尼 著 任东来 胡晓进 译

译林出版社

Dick Cheney

我的岁月 切尼回忆录

[美国] 迪克·切尼 莉兹·切尼 著

任东来 胡晓进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岁月: 切尼回忆录 / (美)切尼 (Cheney, D.), (美)切尼 (Cheney, L.) 著;
任东来, 胡晓进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1

(传记译林)

书名原文: In my time: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

ISBN 978-7-5447-4917-6

I. ①我… II. ①切… ②切… ③任… ④胡… III. ①切尼, D.-回忆录
IV. ①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78974号

In My Time: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 by Dick Cheney with Liz Cheney
Originally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Richard B. Cheney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reshold Edition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48号

书 名	我的岁月: 切尼回忆录
作 者	[美国] 迪克·切尼 莉兹·切尼
译 者	任东来 胡晓进
责任编辑	许 昆
原文出版	Threshold Edition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处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厂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数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数	27
插 页 数	18
字 数	375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17-6
定 价	4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谨以本书献给林恩，她帮助我完成这部回忆录

目 录

序幕 2001年9月11日	1
第一章 早年	9
第二章 这里有叫切尼的吗?	32
第三章 后座	55
第四章 来自怀俄明的绅士	89
第五章 部长先生	123
第六章 “沙漠盾牌”	147
第七章 “沙漠风暴”	170
第八章 退出舞台	194
第九章 第一流	217
第十章 垂钓者	244
第十一章 战争中的国家	266
第十二章 解放伊拉克	293
第十三章 情报与政治	323
第十四章 增兵	350
第十五章 挫折	374
第十六章 结局	396
尾声	415
致谢	422

■ 序 幕

2001年9月11日

白宫特工吉米·斯科特破门而入：“副总统先生，我们现在就得走。”不等我回话，他就蹿到我桌子后，一手放在我的腰上，一手扶着我的肩，将我推出自己的办公室。他催着我急速穿过狭窄的白宫西翼走廊，沿着楼梯走向位于白宫地下的总统应急指挥中心。

我们停在楼梯底端、总统应急指挥中心外的隧道里，我看到特勤处的特工在楼梯的顶部、中部和底部站岗守卫，建立防御层，以防白宫自身受到攻击。特工斯科特还多带了枪支、手电筒与防毒面具。他告诉我，他将我从办公室中疏散，是因为他从自己的无线电中得知，一架不明身份的入境飞机正向代号为“王冠”的白宫飞来。

没过多久，传来另一个消息。斯科特说：“长官，向我们飞来的飞机刚撞上了五角大楼。”这时我才确知，纽约与华盛顿都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仍在佛罗里达州一所小学的小布什总统，不得不离开。我转向隧道里的一个特工：“给我接总统。”他拿起墙上的电话听筒，拨通了电话。

这是自被劫持客机撞上纽约世贸大厦后，我第二次致电总统，他也正极力与我联络。通信故障切断了我们先前的通话，在等待这次通话时，我看到隧道中的老式电视显示出世贸大楼熊熊燃烧的画面。接通总统后，我告诉他，五角大楼被击中了，并敦促他远离华盛顿；因为整个城市都遭到攻击，白宫也是目标。我知道，他不希望表现出临阵退缩，但在我们进

一步弄清情况之前,他真的不应该待在白宫。

当飞机袭击开始时,我的妻子林恩·切尼正在华盛顿市区,负责保护她的特工细心地将她带到白宫。她到达隧道的时间是接近上午10点,当时我刚结束与总统的通话,她随我一起走入总统应急指挥中心。我在大会议桌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这张桌子占据了这间镶满木板的房间的绝大部分空间。桌子下方的格子里放着几部电话,正对着我的墙上是两面大电视屏幕和一台摄像机,用来开电视会议。另一边墙上也有一台摄像机和两面电视屏幕。我背后的那面墙上,则是一个巨大的总统印玺图案。

我们进入总统应急指挥中心后不久,电视里就播出了世贸大厦南楼垮塌的画面。林恩和我都知道,我们刚刚目睹了数百,也许是数千无辜生命灰飞烟灭。

交通部长诺姆·米内塔是最早进入总统应急指挥中心的那批人之一,他正在列出航班班次清单,努力弄清哪些飞机确实遭到劫持并实施了撞击,哪些仍在空中对我们构成威胁。诺姆占用了两部电话,联邦航空局用着其中一部,他的办公室主任用着另一部,在我们知道该如何应对之前,他们要尽力清理领空。在遭遇紧急情况时,商业航线的飞行员通常拥有操纵飞机的巨大自由决定权;很显然,有人已经告诉诺姆,飞行员可以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让飞机降落。我听到他以一种十分确定的口气说,飞行员的自由决定权在今天并不适用。他下令:“让所有的飞机立即降落。”

在开始的那几个小时,我们都处于战争的迷雾之中。我们接到报告说,有六架国内航班飞机可能被劫持了,随后又减少到四架。对于五角大楼到底是被客机、直升机还是汽车炸弹击中,我们收到的报告也不尽一致。我们一开始还接到报告说,华盛顿爆炸四起,林肯纪念堂、国会山与国务院都发生了爆炸。我们还听说,一架来历不明、无人回应的飞机正冲向戴维营,另一架冲向得克萨斯的克劳福德;我们还听到威胁“空军一号”的消息。

上午10点15分左右,一位身着军装的助手进入房间,告诉我,一架确信已被劫持的飞机正在八十英里之外,向华盛顿飞来。他问我,是否授权我们的战斗空中巡逻机靠近该飞机,也就是说,我们的战斗机飞行员是否有权击落确信被劫持的美国商用飞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副总统阁下，现在飞机距我们还有六十英里，是否授权他们靠近？”“是的。”我又一次回答道。

我无法找到其他的答案。过去的一个半小时已经非常残酷地表明，一旦飞机被劫，就成了敌人手中的武器。在我们早些时候的通话中，总统和我讨论过我们的战斗空中巡逻机的问题，它们是在空中保护美国的战斗机，它们需要战斗规则。总统同意了我提出的建议：他授权战斗空中巡逻机向被劫持并且不转向的民航飞机开火。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已经惨遭涂炭，我们毫无疑问要采取行动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但是，我刚刚下达的残酷命令，还是震惊了总统应急指挥心里的所有人，整个房间陷入一片沉默之中。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希·博尔顿从自己的椅子上欠起身来，建议我们与总统保持联系，让他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早上10点18分，我拿起我旁边抽屉里的保密电话，呼叫“空军一号”。“空军一号”已经离开了佛罗里达，向西飞去，总统幕僚们正在寻找一个安全处所，以便总统可以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总统接到电话后，我告诉他自己下达的开火命令。

当我们得到消息说，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敦坠落，我们很快又陷入了某种紧张状态。它是迫降的吗？还是被我授权开火的战斗机飞行员击落的呢？最终，我们得知，一种英雄主义的壮举致使美联航九十三号航班在宾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田野中坠毁。九十三号航班上的乘客了解到当天早上其他被劫持飞机的命运后，冲进了驾驶舱。这些英勇的男男女女，以牺牲自我性命的壮举，挽救了其他许多人的性命，其中也可能包括那天上午身处白宫的我们这些人。

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副手埃里克·埃德尔曼，曾是国务院的老牌外交官，他走进总统应急指挥中心，带来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副手史蒂夫·哈德利给我的口信。他说：“副总统阁下，史蒂夫认为你应该疏散。”我告诉埃里克，自己哪儿也不去。我知道总统是安全的。我知道在我们的通信一再受阻的时候，我必须维持自己的通信能力。“埃里克，如果我们离开这里，上直升机疏散，至少需要四十五分钟，我才能重新与外界取得联系。这段宝贵时间，我们损失不起啊！告诉哈德利，我们原地不动。”

林恩一直坐在会议桌的一端，她给我带来了家庭成员的消息。她从

白宫特勤处获知,他们已经将我们的孩子和孙辈接到了安全的地方。上午10点28分,世贸大厦的第二栋楼也倒塌了,房间里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那栋楼里的人,也是父母、妻子丈夫、姐妹兄弟、儿子女儿啊!他们不是战争中的战斗人员,而是忙于生计的普通人啊!他们就这样惨遭屠杀,无视无辜生命的恐怖主义者,使他们的家人陷入痛苦的深渊。

就在世贸大厦的这栋楼倒塌的几分钟里,有人告诉我,一架朝华盛顿方向飞来的飞机坠落在俄亥俄和肯塔基的边界上。还有传言说,另一架被劫持的飞机距白宫仅五英里。我说:“把它除掉,如果它看上去造成威胁,就把它打下来。”

10点39分,我联系上了国防部长唐·拉姆斯菲尔德,与他交换信息,他在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一份文件保留了我们的对话:

副总统:我们至少三次收到消息,说有飞机在向华盛顿靠近,其中两次确信飞机被劫持了。另外,根据总统的指示,我授权将它们除掉。你能听见吗?

国防部长:是的,我明白。你向谁下达了命令?

副总统:命令是从这儿,通过白宫的指挥中心传达的,从地下室发出的。

国防部长:好的,我要先问个问题:命令是否已经传达到了飞机?

副总统:是的。

国防部长: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有些飞机已经收到了这样的命令?

副总统:对的,据我理解,他们已经除掉了几架。

国防部长:我们还不能确认。我们收到消息,有架飞机掉下来了,但尚没有战斗机飞行员向我们报告此事。

“9·11”委员会后来发现,尽管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飞行员获准开火,但北美空防司令部的东北空防部,并没有向从兰利空军基地紧急起飞的战斗机飞行员下达开火命令,只有一架民航客机——九十三号航班,坠落在宾州的尚克斯维尔附近。我们以为在俄亥俄和肯塔基边界坠毁了的那架,实际上是美国航空公司的七十七号航班,这架飞机曾朝白宫方向飞

来。它从我们头上飞走之后，又冲白宫飞了过来，逼我们撤离。然后，它走上了冲向五角大楼的死亡之旅。

那天上午，在我的脑海里，有两件事最为重要：清除空中的所有飞机，预防进一步的攻击；保证美国政府继续运转。我们立即采取预防措施，确保任何攻击华盛顿的行为，都不会使我们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在事态明晰之前，总统不得回到华盛顿。我们疏散了众议院与参议院的主要领袖，将他们送往华盛顿之外的安全处所。在找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德时，我还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找到了他，他的保卫组将他从那儿带走了。我告诉了他当时的最新情况，敦促他转移到安全之地，他照办了。那天，我至少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非常重要，因为在继承总统职权的序列中，他名列第二位。

参议院临时议长罗伯特·伯德，在继承总统职权的序列中仅次于众议院议长，他拒绝转移到安全处所，而是回家了。其他一些被疏散的人，也急着尽可能快些返回华盛顿。对于这一点，我的朋友，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参议员唐·尼克利斯曾问我，为什么行政分支有权决定同为政府分支的国会的成员何时返回华盛顿？我告诉他说：“唐，因为我们有直升机。”

由于所有飞往与飞离美国大陆的飞机都停飞了，滞留各处的高级官员开始要求派飞机去接他们。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被困在了瑞士的苏黎世。袭击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范围巨大，我们需要艾伦回到美国来帮我们处理。我请五角大楼给他派了一架飞机。

当我们在总统应急指挥中心积极应对时，白宫的形势分析室也在召开另一个会议。总统应急指挥中心的同僚试图通过视频，将两个房间连接起来。我们尝试着将形势分析室里的画面传送到我们这边四个屏幕中的一个上，但我们却听不到会议的任何声音。我们从电视的新闻报道中获得了最佳的实时信息，但是由于技术故障，当形势分析室的会议画面显示出来时，我却听不见电视报道的声音。最终，我请求关掉形势分析室的会议画面，以便我们能听到电视上的报道。我告诉埃里克拿起电话，试着听形势分析室里的会议，但是几分钟后，他描述说，声音的质量“差得像

在游泳池底听《鼠来宝》^①”。我让他挂掉电话。如果楼上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会派人下来,或者直接打电话给我们。

与此同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已经决定,将我们国家的军事警戒等级从和平时期的四级防御,提升至三级,高过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的任何时期。我的办公室主任斯库特·利比与埃里克·埃德尔曼提出,应该有人来告诉俄罗斯人,我们准备提升警戒等级。那时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并不想让他们感到惊讶,以为我们是因为他们而提升警戒等级。我们都经历过冷战,知道应该牢记,这样的行为有可能导致错误的核对抗。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打了电话,接通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得到的回复是,他支持美国的行为。鉴于美国遭到攻击,俄罗斯人同意停止他们的军事行动。

我们还作出决定,让“空军一号”降落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以便总统能够向美国民众发表简短的录音讲话。在他着陆的前一刻,我们在总统应急指挥中心得到消息,一些国际航班遇到了麻烦。遍布大西洋沿岸的海岸警卫队,接到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公司和美国大陆航空公司飞机的求助电话。半小时内,我们被告知,这些航班已不再是问题。但是,一架大韩航空公司的飞机,计划飞越太平洋到达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却不断地发出被劫持的蜂鸣声。阿拉斯加州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的战斗机紧急起飞,前去跟踪。

康迪·赖斯问我,我认为总统离开巴克斯代尔后应该去哪儿。我告诉她:“奥马哈附近的奥法特空军基地战略司令部。”从我担任国防部长起,我就知道美国的军事设施遍布全境,可以提供高度安全与现代的通信。战略司令部就是其中之一。在那儿,总统会很安全,在我们的通信能力明显十分微弱的情况下,他在那儿可以跟华盛顿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员保持联系。

截至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我们已经清除了领空中的绝大部分飞机。我们还了解到,很多袭击与劫机报道都是子虚乌有。事态与信息交流趋

^① Alvin and the Chipmunks, 1958年成立的美国动画音乐组合,2007年制作成动画电影,大受欢迎。——译者注

于稳定。我知道，总统一定急着返回华盛顿，在他飞往奥法特空军基地的途中，我们通了一次电话，我建议他考虑一下返回华盛顿的时机。他已经在奥法特安排了一个保密视频会议，以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取得联系。但是，我很确定，在此之后，他就会返回华盛顿特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点很清楚：行政分支中的某个人，完全了解我们对于攻击的早期反应后，应该发表一份声明，让美国民众和全世界都知道，总统安然无恙，美国政府仍在正常运转。袭击并未摧毁我们。我们在总统应急指挥中心收看了电视报道，但是似乎没有一个记者联系行政分支中的任何人，就当前的事态发表权威看法。几位国会议员倒是发表了讲话，但他们都调离了实际掌控国家的职位。

应该有人出来向全国作个正式声明，我知道，这个人不可能是我。我过去的政府经历，包括参与冷战时期持续的政府行动，使我可以应付“9·11”事件最初几个小时的危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冲出去，向媒体发表讲话，将会损害总统的威信，对他、对整个国家，都没什么好处。我们正处于战争时期，我们的总指挥应该显示出强烈与果断的责任感，正如小布什总统所做的那样。我若对公众讲话，将于事无补。

在我看来，总统顾问卡伦·休斯是对媒体发表讲话的合适人选。她当时正好离开了一天，但正在赶往白宫的路上，很快就与副总统顾问玛丽·玛塔林并肩工作，起草了一份声明。由于一系列安保方面的原因，特勤处没有让卡伦使用白宫新闻发布室，他们安排将她送往联邦调查局总部，她在那儿会见了记者。

与此同时，我开始考虑我们对于这种战争行为的反应。我的总顾问戴维·阿丁顿已经被迫疏散，但我又安排他重新回到白宫。他一到达总统应急指挥中心，便通过电话与身处罗斯福厅的总统幕僚团队合作，商讨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需要怎样的立法授权。

我们起初便怀疑这场袭击为基地组织所为。当然其他几个恐怖组织，也有能力组织和发动这种规模的袭击，我们一定会要他们负责，但这还不够。还有一些组织资助了恐怖主义活动，给他们提供武器装备。有些国家给恐怖分子提供安全港湾。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人，也应该为此负责。

总统通过奥法特的保密电话，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在此期

间,布什主义的雏形开始显现。我们会追踪那些伤害我们的恐怖分子,也同样会追踪为他们屠杀般的攻击提供帮助的人。

晚上8点半,总统回到白宫,从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他说:“对于实施这些攻击的恐怖主义者,以及包庇恐怖主义者的人,我们会不加区别地予以打击。”随后,他在总统应急指挥中心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议结束后,林恩和我离开了地下室,通过外交人员通道,走出白宫,到达南草坪。在那儿,有一架白顶的直升机正等着将我们带到未知的安全处所。这是第一次,我离开总统,分处外界未知的处所,此后这样的情形还会多次出现。如果恐怖分子试图对我们的政府实施斩首式打击,我们希望确保他们不会同时干掉我们俩。

随着“海军陆战队二号”升空,我可以看见五角大楼。这栋楼正在冒烟,救援队仍在抢救,烟直往上蹿。我一整天都在看电视里世贸大厦与五角大楼的画面。看到被攻击的地点,我很直观地认识到美国的弱点,以及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我想到1814年华盛顿市遭受英国占领、打击的情形。如今,一百八十七年后,基地组织显示出,他们有能力对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心脏实施毁灭性打击。在这一天,关于我们自身安全的所有认识都改变了,这是一种根本性转变。

我们朝凯托克廷群山和戴维营方向飞去,总统的这个度假地将成为我们在“9·11”之夜不对外公布的避难所。我们到达之后,被带到阿斯本营地。在那儿,我一直到黎明都没睡着,我在想,这次攻击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需要全新的战略来确保美国的安全。21世纪的头一场战争,将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冲突。它将首先是,也基本上是反对恐怖分子的战争,这些恐怖分子在暗处活动,不惧怕威慑,将会利用他们能获得的任何武器,来摧毁我们。

■ 第一章 早年

当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打算给总统发一份电报。因为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是坚定的新政民主党人，所以祖父相信，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将乐意听说，有这么一个“小家伙”与他的生日是同一天。我的父母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结婚，1941年1月30日，我就出生在那儿的布莱恩纪念医院——那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度过了他的五十九岁生日。我母亲有个嗜好，收集优惠券放进剪贴簿，结果省下了三十七美元五十美分的接生费用。

我最早的记忆是跟母亲一起乘坐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我坐在她身旁，我的弟弟鲍勃，大约只有两岁，坐在她腿上。那时还是战争时期，就连过道里都挤满了士兵。其中有个大兵弯下腰来，递给我妈妈一支烟，她接受了，接着大兵又给她点火。这是我经历的最吃惊的事。当时，我还不到四岁，从未见妈妈抽过烟。

妈妈带着我和鲍勃，离开我们在林肯市的家，穿越半个内布拉斯加州，去跟住在萨姆纳的祖父、祖母会合。1944年，爸爸接到入伍通知，在大湖区的海军基地接受训练后，被派往圣地亚哥，他本来以为会随军舰开赴太平洋；谁知就驻扎在圣地亚哥，被编入试航部，负责保障出港的船只适合航行、随时可以投入战斗。我们本应与父亲同行，但在战时，很难在圣地亚哥找到住所。我母亲曾试着留在林肯市，但经过一次阑尾炎打击之后，她最终发觉，无法仅凭一己之力照顾两个小孩。

我们也没法搬过去和她的父母戴维·迪基与克拉丽斯·迪基一起住，因为战争开始后，戴维已经关掉了自己开的小餐馆，并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签了一份合同，为铁路工人当厨师。如今，他与外祖母的家就是一节火车车厢，紧挨着他们做饭的地方，他们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怀俄明境内联合太平洋铁路上过往的维修工人做饭。战后，我和鲍勃很喜欢去看他们。外祖父迪基知道如何将最平淡的日常生活变为一场冒险。他会带我们去钓鲑鱼，用钓来的鱼做晚餐。极少数时候，鸡血和内脏做的诱饵没有招引鱼上钩，他会给我们做一大份意大利面。随后，他与外祖母会将我们抱上铺好油布的桌子，这张我们刚刚用来吃饭的桌子，就是我们的床。在父母和外祖父母吵闹的笑声中，我们悄然入睡，他们则借着隔壁车厢里投射过来的灯光玩杀手游戏。

但是，那样的美好时光还是后来的事。当时，我们正赶往只有二百九十六人的小镇萨姆纳，去投奔我的祖父母切尼。妈妈一定知道，她所享受的那支烟——它令我很吃惊——在很长时间内，将是她所抽的最后一支。

我母亲成长于一个爱放声大笑、爱打牌的家庭。她的父亲喝波旁酒、抽骆驼牌香烟，满肚子都是笑话故事。我的祖父母托马斯·切尼与玛格丽特·切尼则与之相反，他们在年轻时可能就很刻板。在进入银行工作之前，托马斯曾是一名教师。玛格丽特则在严格的浸礼会氛围中长大，从不与烟草、酒精与赌博为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她也不认为孙辈们应该看连环画。祖母切尼已经六十八岁了，将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小发髻；白头发的祖父，背挺得笔直，已经七十五岁了。在妈妈带着两个吵吵闹闹的小家伙到来之前，他们自食其力，安静地生活了很多年。

切尼家族最初是从英格兰移民到美洲的，他们是1630年代伟大清教徒移民的一份子。切尼家族在麻省及其附近生活了七代人之久，但到了19世纪中期，塞缪尔·弗莱彻·切尼打破成规，向西迁到俄亥俄州的迪法恩斯。内战打响后，他就加入了捍卫联邦的战斗，内战四年期间，他都在军中服役。亚特兰大战役时，他驻守在石河与奇克莫加河，随谢尔曼将军一起向海边进军。1865年5月，他所在的俄亥俄第二十一团正好驻扎

在华盛顿特区郊外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参加了十五万人的胜利大阅兵。他随队伍经过白宫，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与内阁成员，还有格兰特将军与谢尔曼将军，都向这些赢得内战的勇士们致敬。

塞缪尔身经大小三十四战，却毫发无损，还成功躲过了致众多战友于死地的可怕传染病。但就在回到俄亥俄迪法恩斯陪伴妻子和两个女儿后不久，他的手却卷进了一台圆锯中，左手手指全被锯断。

1883年，整个国家都在漫长的经济萧条中苦苦挣扎，塞缪尔也不得不卖掉自己与人合开的门窗工场，以偿还债务。五十四岁的塞缪尔·切尼被迫重头再来。他拖曳着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儿子，向西迁徙八百英里，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布法罗县申请了一片宅地农场。

切尼一家在大平原上盖了茅草屋，种下了树木和庄稼，慢慢开始了新生活。两年之内，他们获得了自己的一百六十英亩土地，并得到了毗连的一片土地，用来种树。在1890年代初的干旱袭来之前，这些财产增值不少。但是干旱让庄稼和树木相继枯死，最终经济环境的严峻程度，更甚于迫使他们迁来此地的1880年代。塞缪尔发现自己已经资不抵债了。正如他自己所声明的那样，尽管自己信用记录良好，但是“当时银行不向任何人贷款”。1896年，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所有财产在卡尼县法院大楼前的台阶上被拍卖。

在奥马哈境内过了几年居无定所的生活后，1904年，塞缪尔又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桑德丘陵申请了第二份宅地农场。一位曾经在石河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朋友写道：“切尼真是百折不挠。”塞缪尔也确实笑到了最后：直到1911年他以八十二岁高龄逝世时，他还坚守着那片宅地农场。

塞缪尔将他的二儿子取名为谢尔曼，以纪念他曾跟随着向海边进军的那位将军；将三儿子——我的祖父取名为托马斯，以纪念内战中的乔治·托马斯将军——奇克莫加河之砥柱，塞缪尔也曾在其麾下战斗过。我祖父的名字中间有个赫伯特，因此所有人都将他简称为伯特。十多岁时，他的父亲第一次申请宅地农场，年轻的伯特就帮着从自家的草原上切草皮砖，帮忙种植棉白杨树，不下雨时，这种树常常会死掉。他决心要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不用天天早上起来，焦急地看着天，计算自己的命运。

在萨姆纳，伯特终于发家致富了，成为农商银行的出纳和股东。当他

的第一个妻子死于肺炎之后,他又娶了一个教师兼教会领袖。与他一样,她也是社区栋梁。1915年6月26日,四十六岁的伯特与三十八岁的玛格丽特·泰勒·切尼成为我父亲理查德·赫伯特·切尼的双亲。

尽管伯特精打细算,并大获成功,但他还是发现,他与自己的父亲一样,无法逃脱自然的可怕力量。1930年代初,当干旱袭来时,农场主都无法偿还债务,商店也关门大吉。农商银行也是如此。多年以后,我父亲才告诉我银行倒闭时的情形。他当时在萨姆纳市中心,正好遇到银行督察员。当时是下午1点,但银行仍未开门。督察员问我父亲,你爸爸在哪儿。人们议论纷纷,督察员说,某些人最好动作迅速一点。我父亲跑回家,发现他父亲与银行董事会成员都在客厅,他们痛苦地决定关闭银行。除了自己的住所外,我祖父失去了所有财产。

理查德是个聪明的孩子,他自己学会了打字,并利用刻钢板、操作油印机挣钱,上了卡尼州立师范学院。他主攻商业,成绩优异。但因为要一边上学一边工作,所以需要五年才能毕业。他有些等不急,手头又缺钱,便参加了文官考试,在位于州首府林肯市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得到了一份高级打字员的工作。经过了这么长时间贫困潦倒的生活,他发现,每月一百二十美元的薪水、有保障的政府职位,实在是太棒了,舍不得丢掉。

不久后,他得到了联邦政府另一个机构土壤保持局的工作。土壤保持局向农民传授防止土壤被大萧条时期沙尘暴卷走的技术,诸如农作物轮作、梯田种植、等高耕种^①、利用树木“防护带”充当防风林。我父亲在土壤保持局干了三十多年,所做的工作是他最引以为傲的。

还让他感到自豪的是联邦工作给他带来的养老金。直到长大成人,了解到他父母和祖辈所经历的经济灾难,以及这些灾难给他青年时期所带来的阴影后,我才真正理解了他的这种自豪感。我常常在想,他给自己家庭提供的高度稳定的环境带来了什么不同的结果?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稳定的环境,我才会去冒险,不假思索地改换方向,从一个领域跨入另一个领域。

土壤保持局将我父亲从林肯市调入内布拉斯加州东南的另一个小城

^① 在斜坡上按等高线开沟耕种,使沟呈一定的弧度,而非一条直线,以防止水土流失。——译者注